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嶺南文化新探究論文集

(抽印本)

林天蔚 主編

香港·1996

現代教育研究社出版

丘濬《朱子學的》與宋元明初

朱子學的相關問題

朱鴻林

引言

明儒丘濬（永樂十九年至弘治八年，1421—1495年）傳世的重要著作之中，《朱子學的》成書最早，篇幅最小，受到近人的注意也最少。但從學術思想史的角度看，此書卻富有研究的價值。理由不止於此書的內容是丘濬個人成學的印證，可以讓我們衡量他的學養的深淺高低；也不止於此書的成編象徵了丘濬為初學者提供了一套系統周延而繁簡適中的朱子學說要旨概論，這種努力的成果，可以反映他的治學取向和學問依歸；更具意義的，也是本文所擬着重探討的，此書的編纂原委，其實為史學者提供了探究後人系統性綜結朱子學說和傳述朱子學說的做法的脈絡。而追尋這個脈絡的發展，除了可以充實「朱子學」本身的歷史之外，還有助於理解明代中葉王學能夠崛起與盛行的一些助緣。

丘濬是明代廣東瓊山縣人，景泰五年（1454年）成進士，選入翰林，以後歷任包括翰林院學士、國子監祭酒、禮部尚書等要職，卒於武英殿大學士任上，《明史》及《明代名人傳》均有傳記^①。近人對他的生平志事、經世學術和史學思想等，亦有深入的研究^②。這些研究的結果顯示，丘濬的學問、著述影響後代甚大，並不因《明儒學案》不見傳載而不成為儒者。實際上，他是明、清二代多數學者公認的傑出朱子學者，也是同時期內朝鮮和日本二國朱子學者高度尊重的人物^③。用他評價唐代曲江張九齡的語法和詞藻來比擬他本人^④，我們有理由可以說，丘濬山不只是嶺南或江南的第一流人物，他其實也是明代的第一流人物，只是沒有從祀孔廟而已^⑤。

丘濬以著作名家，生平所作詩文和參與編纂的官書數量極多^⑥，獨力完成的著作，有名而重要的也有四種。其中最為時人和後世稱道、影響最為深遠的，自然是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成書，進呈後即為明孝宗所嘉許，因而下令刊印賜存於官方學校的經世之學鉅典《大學衍義補》^⑦。在此之前，他還著有成化十五年（1479年）成書、弘治元年（1488年）刊行的編年體史書《世史正綱》^⑧，以及成化十年（1474年）成書，同時或稍後印行的禮儀用書《家禮儀節》^⑨。這三部明、清二代屢屢重刻印行的著作所處理的問題，層面很多，包括了政治體制、財經和法律、軍事等策略、政治倫理標準和種族思想，以及社會禮教等方面，引起官員和學者們的稱許採用和批評修訂也很多。

這三部著作的內容細節和成就高低，這裏不能詳說。值得提出應予注意之處是，這些著作都與朱子的學說或朱門後學的學術直接有關。《大學衍義補》顧名思義，是補充朱學距于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不足之處的著作。《世史正綱》起緣於對朱子《通鑑綱目》書中處理朝代正統問題的不同看法。《家禮儀節》則替朱子《家禮》一書去難存易，提供儀式，以便學者利用。這些著作，證明了丘濬對朱子學術的始終宗仰和從事。從這些著作之能批判性的繼承朱學的精華和發揮朱學的全體宗旨的特點來看，丘濬可以說是深得朱學精粹的忠實朱子學者。評論前輩，去其偏差而取其精要，予以具體發揚，正是朱子綜括北宋道學大家而集其大成的態度和做法，丘濬在師學朱子時，也深入的掌握和發揮了這種態度和做法。

丘濬之能有這樣的體驗和表現，從他一生的求學經歷來看，他的得力處在於他壯年入官翰林後，精心鑽研朱子著述一事。這是他堅實的根基，而他的具體表現，便是天順七年（1463年），他四十三歲時成編的《朱子學的》一書^⑩。

儘管《朱子學的》和上述丘濬前此所撰三書比較起來，知名度和影響力均見遜色，但它在朱子學派的文獻裏，始終還是享有顯著的地位。現在可考的，此書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以前，已有不明刊的刻本。正德三年（1508年）婺源令郭濂、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婺源朱子裔孫朱崇沐曾先後作過翻刻^⑪。其時並存在著二個板式不同的刻本。其中出現較早的一個後來傳到日本，鶴信之據以刊成承應二年（清順治十年，1653年）的和刻訓點本^⑫；在中國國內，入了清代，則又出現了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經由翁方綱校正體式的瓊山刊本和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據之校補重印的石洲草堂校刊本^⑬。另一明刻本，入清以後，有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張伯行據以重刊的《正誼堂全書》本；此本同治五年（1866年）有福州正誼書局重刻本，民國五年（1916年）又有福建經學會的排印本。《正誼堂全書》本後來收入於《叢書集成初編》內，加以斷句，成為現代的通行本^⑭。這個傳刻的簡史，反映了此書長時間內仍為朱子學者所重視。

《朱子學的》的內容

《朱子學的》共分上、下二卷（編），每卷（編）各有十篇，每篇含若干節，每節文字或只一則，或含多則，各則均只是朱子本人論學之語或門人後學記述朱子言之言，沒有丘濬自加的詳釋註文。總計上卷一百七十一節，五百八十七則，下卷三百四十三節，六百七十四則，全書共二十篇，五百一十四節，一千二百五十二則。另有丘濬所撰識語一首十六則，刊本多繫於書末，也有改置於卷首的。識語在書中沒有標題，但在最早的丘濬文集、七十卷本的《瓊室類稿》中，已經題作《學の後序》，而以後的文集刊本，也例以《後序》稱之^⑮。

《後序》開章明義，即說《朱子學的》是一本「擬《論語》」之作，以故全書二十篇的命名，也是取法《論語》的。其例每篇於第一節文句中取二字為辭，且多取於首句，猶如《論語》之名《述而》、《為政》之類。篇名和篇中的內容，也和《論

語》的情形一樣，不一定能夠互相反映；篇名能否概括一篇的大旨，也沒有一定的規則。但和《論語》各篇內容的組合基本不同的是，《朱子學的》每篇自有其內在的連貫性，篇與篇之間也有一定的結構邏輯。各篇的內容梗概，依次如下^⑯：

下學第一（17節33則）

此篇題下有「總論為學之道」注文一句，提示了整篇的意旨。首節即引朱子「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理只在事中」句，等如全書大旨的發凡。以下依次說為學即在盡為人之道，必先盡己，乃可及人，而其內涵總要，則如程子所說的「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要點在於居敬窮理，知行並進。實行的次序大略，則自小學之躬行開始，持敬以進，由平近易為至於高遠深邃。總之，為學無非為治心明理之事，而以「始乎為士，終乎聖人」為目的。

持敬第二（11節36則）

此篇題下有「涵養須用敬」注句，提示一篇旨意所在。篇文依次先示敬於學問的重要性，然後訓釋敬的涵義，敬所表現之處及表現之法則、居敬之要、持敬之功、敬之大用，用力於敬的方法，以見持敬實是為學的本領和始終功夫。

窮理第三（19節60則）

此篇題下有「進學則在致知」注句，提示一篇旨意所在。各節依次提示格物與致知之別，窮理即格物之故，即物窮理而由累積以待貫通之旨。再就「讀書是格物一事」之意，詳說讀書之法。篇末部分再申「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而其大法必基源於「居敬以持志」之旨，與前篇所言者會合，以綜結第一篇所言為學之道大端在於居敬窮理之旨。

精蘊第四（16節60則）

此篇繼續申明讀書為窮理之法的意旨，而所提及的應讀之書，則以儒家經典，尤其理學家所重視者為主。各節提示了應讀各書的大旨與讀法，以及用功的次序。所言各書，依次為《四書》、《詩》、《書》、《儀禮》、《禮記》、《樂》、《周禮》、《易》（並及《河圖》、《洛書》）、《春秋》、《孝經》。結尾申明了讀經書必以「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為先的考文意旨。

須看第五（13節103則）

此篇亦繼續申明讀書為窮理之法的旨，而所提及的則以兩宋理學家典籍為主。以《小學》、《近思錄》為始，以及及於周子之《太極圖》、《通書》，二程之《定性書》、《四箴》，張子之《西銘》，朱子之《易啟蒙》與《通鑑綱目》。所引文字述及以上各書的大旨和表達這些大旨的諸多理學概念的基本訓義，而以論窮理之目的與功用的說話作結。

經策第六（15節54則）

此篇說為學關於「行」的方面，是接前篇言為學關於「言」的方面而來的。重點在強調「心學」，可以作為窮理目的的引申看待。各節依次言讀書窮理之貴於實踐，

學之在乎變化氣質，為學功夫首在求放心，有關身心修養諸概念之訓義與治心之法。結尾部分則言省克己的原則大法，以見敬為明理寡慾的根本。

進德第七（22節59則）

此篇闡明進德之方，「大率要〔於〕修身窮理」。所言及的修身之法，包括如何懲忿窒慾，端容貌，慎言語，處事待人，知恥改過，持志忍窮，辨別義利，夾持敬義，以及學問為己、為人之辨等道理與法則。

道在第八（19節73則）

此篇說天道之表現在於五倫的道理。五倫以近而親者至遠而疏者為序，故依次言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所說包括事父母之道，事不道父母之道，父母愛子之道，兄弟相處之道（推及對待宗族之道），夫婦相處之道，為婦人之道，處友親師之道，君臣名義及忠仕公私名理，君道與臣道的要則，而以綱常總論為結。

天德第九（20節36則）

此篇闡述理學的基本哲學概念，解說概念的名義和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係。由言敬功之大，以及於太極、陰陽、五行、形氣、動靜、人物、性情、心身、理氣、體用等。以太極無極之關係為始，以心之體用該貫天地萬物為終，以見學者之的，實在於盡心。

韋齋第十（19節64則）

此篇正如本書〈後序〉所言，乃「倣《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引列朱子所語及門人記載，以見朱子學問之家庭及師友淵源，朱子平居之容貌威儀與生活習慣，居鄉蒞官之施為，立朝之言論、態度，乃至家居講學之情況，而以朱子終身操履之形贊作結。

上達第十一（35節68則）

此篇言天理與性道之精微，依次說太極、理氣、陰陽、五行道性、動靜鬼神，接及性命、四德四端、心意才志、人心道心、中庸誠信、理事精義等。

古者第十二（42節75則）

此篇說教人與自學、為治與處事的道理及方法。先自小學所學為大學之學的基礎一義說起，以次及於教小兒法、教生徒法、教養中之養道、學文科舉之態度、讀書目的、為己之學之法、為學之道理原則及功夫要項等。再就為學的方法而言，論及讀書看事之法，談論立學之態度，讀古書及解經之原則大法，以及論事觀人之法。結尾則言《大學》格致之真義，以及為己、為人之學的分別。

此學第十三（31節59則）

此篇言學所以求知道與行道，而皆須就事上表現以驗所學的道理。因為學必講明道理，「以存諸心，行諸身，而見諸事業」，故此各節所言及的，包括了處事之經權準則，應事之胸次，居位盡職、顯隱隨機、出處語默等之求適於義的道理等。大旨在說凡事當但問是非邪正，不計利害得失，而終歸以循理遂志為極則。

仁禮第十四（30節60則）

此篇言仁與禮的名義和關係，謂能仁則合理、行禮即為仁。所舉言論，以禮之節文為主，以見理散於事之旨。先說仁與四端之關係，接言仁之地位，求仁之要義，守敬為仁之道，克復禮而由近推遠為實在行仁、為仁之道。再說講習禮文為行仁之必要，因而及於祠堂祭祀及家禮四禮各項，而以喪祭為詳，以見人為鬼神之主的道理。

為治第十五（30節59則）

此篇顧名思義，是就事例而說為治之理，以明誠敬為為治根本之義。各節先說識治體之要及居官首敬之道，次說為政寬嚴、更張去甚之旨。繼以作縣之要項，尤其致意於民瘼恤政之制、鄉社教民之法、州縣刑獄、詞訟財賦及荒政等事。再及財利專否與國家安危之道、作大吏之要、為大臣之道等，而以求取人才及隨時整理為經世之法作結。

紀綱第十六（37節67則）

此篇說及治道與政術的大端大要，起言天下紀綱繫於人主之心術，結言立制度所以為永久之計。中間所述，包括人主正心術之法，人主守法事學之則，君道始於人主之齊家而尤當審慎於宦官太子之事，立三綱以維繫民心之事，人主之學政態度、求治要道，君子小人之分，君相要職與盡職之道，人君待相之道，忠佞之別，紀綱與風俗互相為用之理，以義為利、無過斂以傷民心之理財原則，學政與刑政之原則，以及人主謹慎小心之重要性。

聖人第十七（55節81則）

此篇載論古今聖賢之言。從本天行道之為聖的定義說起，舉三代聖君為例，遂及後世歷代賢主及賢聖之臣，所舉例子及於南宋。各例皆言其賢處何在，間中也取似是而非者為例，以反見不善之處。

前輩第十八（19節74則）

此篇論歷代名儒、名臣以及朱子本朝人物的學術作品，多作比較之言。因論人而論及文章道術，先評漢、唐、宋名家之文，又由正科舉文體而辨章學術，指出當世學術分裂之大端，再評老莊之學的要旨、佛老的異同之處、儒釋為道為學的根本異處。結尾說到術道辨邪之態度，以闢異端，貴於自治為儒者當然的依歸。

斯文第十九（25節83則）

此篇論儒家道統中人物的學問。自孔子及孔門高弟起，歷北宋諸儒、程門高弟，而朱子學侶、朱門高弟，評論各人所學高妙得力之處，間中也比較彼此異同之處，以見各人為學的要領及其所得成就。結尾闡明賢聖人皆可以力學而至之理，通篇實寓朱子為儒道斯文所繫之意。

道統第二十（39節48則）

此篇顧名思義，言儒家道統之歸在於朱子。由堯、舜、孔子說起，歷舉朱子對北宋

四子之贊語，朱子之自贊，以見得道統者之學術氣象，接連朱子學道的里程，朱子所以著述傳道之故，引列朱子自評及門人後學評贊《四書》、《諸經史》、《小學》等著述之言，再述朱子生平行品志節，最後解釋「敬」為朱子道學之極至及贊朱子所以為得道統之正的原故。

綜結起來，《朱子學的》二十篇的內容，依次揭揚了朱子所示的為學之道，治學之方，窮理讀書之法，踐履進德之則，人倫相處之道，理學形上概念，朱子生平言行出處，天理與性道關係，教人與治事法則，知行體驗關係，仁禮關係與節目，為治與經世之理法，治道與政術之大端，歷代聖賢名臣賢聖之故，備釋道根本異處，道統中人之學問，以及朱子所以得道統之正之故。這些內容的概括度和編次的周延性，以我們能夠掌握的文獻來衡量，都是超越前人的。這點下文還有分析。

《朱子學的》的宗旨和編纂理據

丘濬對於和本書的宗旨及編次有關的要項，也有所交代。〈後序〉的最後一則說：「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於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也。」丘濬就是透過這種自擬問答的體裁，扼要的表示了自己編書的目的、本書的主旨和編次的理據，從而也表達了他對朱子學說的理解和系統地綜結表述朱子學說的主張。

〈後序〉對於作《學的》以「擬《論語》」這個大主張，作了優先解釋。丘濬認為他這樣做，是「采輯朱子語而竊推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王）通也，效曾子、有子之門人也」；辯稱這不是如「王通自著書，以己擬孔子」，所以不算「僭」越。丘氏這個極度推崇朱子的表現，後代尊朱的學者多表同情，但卻也引起過《四庫全書》館臣的指責，認為他這個使朱子本人或朱子言語「貌似聖人」的做法，「豈朱子所樂受乎？」^①在這個不同時代學風所導致的貶貶之下^②，館臣大概是認為此書的編纂原則已誤，其他更無足觀，所以不只沒有著錄此書，即使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也只列明此書的篇名，引述後代序者所說此書比擬《論語》之處，作了上面所引述的評語，而對書中的內容和編旨不作任何評論。館臣最重要的意見，便是反對推崇朱子直繼孔子的意見，對於《朱子學的》在選材和組織上的合理與否和優劣程度，其實並無意見。

至於此書何以名作「學的」，〈後序〉有這樣的一則說：「『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子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這一解釋，看來似乏周延。推丘氏之意，其實是在提供「中的」的方法，而這個方法，也就是朱子教人學為聖人的方法了。

〈後序〉另有（第八）、（第九）二則重要文字，說明此書上、下二卷（編）各篇編次的涵義。這二則文字，其實也同時表達了丘濬對朱子學體系個人自得和整

體建構，值得詳引：

（第八則）所謂次第者何？姑以前篇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則可以上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道。《大學》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己之學，必先致法於人，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義，一一周遍，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

若通論其一書，則首篇是其凡。其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功夫，須必先於持敬，敬不可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講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致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

學者下學人學，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假《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者以標的也。

（第九則）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何？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事以達於理，下編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

這二則文字辭暢意達，基本上也便是朱子所曾揭示的為學原則和綱領。但這個下學上達，亦即由事以達於理、由進德以言成德的循序積累的漸進方法，便和（第十則所言）「自昔先儒論教，皆自內而外之」的方法相反。丘濬的理由是，「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兩。」在這個為初學者提供起步的指導原則之下，丘濬在強調讀書為窮理之本之餘，在本書的選材和因排列次序而顯示出的為學次第上，也作了與一般性理書籍不同的安排。〈後序〉有二則指出和解釋其特點所在。一則（第十二則）說：「《六經》次第，皆始《易》，次《書》、《詩》、《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次則（第十三則）又說：「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這個淺深和近遠依次漸進的方法論，其實也就是丘濬自己的治學總取向。他不尚躐等，不尚空言性理，而尚因事求理，因行實知的主張，還體現在（如第十四則所言）「上編既言敬矣，而下編又專以仁禮為一（編）〔篇〕」的安排上。理由是「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

總之，在丘濬的認識中，朱子的學說和教人學為聖賢的方法，都是有層次的。朱子學，簡而言之，便是有的可致而有法可循之學。由事達理，由下而上，由

近及遠，由淺到深，都是有一定不可逾越的程序的。丘濬對此篤信無疑，本書上、下二卷（編）各篇層層深入，下卷各篇平均又較上卷各篇深入近裏，如上卷末篇〈韋齋〉說的是朱子的生平，下卷末篇〈道統〉說的則是朱子在道統中的地位，便是最具體的表現了。

丘濬當時還要回答的重大問題，也是研究丘濬和研究朱子學者必然會提出的問題是，《朱子學的》究竟有無出現的必要？這個關於編輯《朱子學的》的理據問題，牽涉的是著作的原創性和對學術有無貢獻的價值問題。丘濬對此未曾忽視，並在〈後序〉中提出了如下二則的說明：

（第三則）朱子之言，天下後世家傳而人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按察陋而妄有所辨也。

（第四則）今所料者，多經書傳註中語，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替之者何？此亦朱子輯《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

這兩則問答，顯示了丘濬刻意系統化建構綜結朱子學說的用心。無疑，採取包括經典傳註在內的朱子全部著述，使之成為自具體系的成書。假如取材精確而編輯合理，朱子學說的整理大旨要義，自然便能高度的集中表現出來，其道理和朱子、呂祖謙編輯《近思錄》以綜括周、張、二程之學相同。朱子著作，言滿天下，但確如丘濬所說的，卻沒有一本闡述一己全體學說的成書，故就尊崇朱子和揚揚朱學而言，不得不說丘濬編輯《朱子學的》之舉，其識見實有高超過人之處。

編輯學說始創人的著述的工作，本來是學派形成過程中重要而常見之事。它關係到學者從何能夠自得一家學說要旨的根本問題，也是學術思想史上，諸如重要哲學理念和學術主張的傳播、演變和修正，以致不同時期內學說涵索所獲得的注意比重等通常課題的基礎。但就朱子一家之學而言，朱子著述全面性編集和選擇性編輯二者，性質上和意義上明顯都有不同。學者要掌握朱子學說的要旨，自然不能只靠闡明朱子言論的後學文字，但要親身閱讀保存原貌的原始資料，卻又免不了因朱子著述的浩繁而感到茫然失措，心力不足，不易取得成就。故此最需要的，尤其對於初學或自學者而言，無疑便是一種分量適中、本身能夠自相發明又有內在連貫性的原始資料的讀本了。事實上，朱子編輯《近思錄》為的也便在提供一本具有上述性質的基本讀物。《近思錄》的緣起，是因與歎於周、張、二程之書「廣大闡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朱子的目的，是要藉此選編，把四家之學的梗概，給「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得其門而入矣」^{①9}。朱子之書，比起北宋四子的，更加「廣大闡博，若無津涯」，故此同樣有待發見梗概，以示入門的需要。丘濬〈後序〉中稱《學的》此「書為初學者作也」，正表明了他為初學提供門徑的用心和做法，和朱子編輯《近思錄》的用心和做法，是一脈相承的。

丘濬《朱子學的》的取材和編輯次第，是他系統化綜結朱子學術的具體表現。這和《近思錄》的取材和編輯次第，是朱子系統化綜結周、張、二程四子學術

的具體表現，道理是相同的。所以張伯行說的「朱子集周、張、二程之言，作《近思錄》、為孔、曾、思、孟之階梯，〔丘〕文莊作《朱子學的》，為周、張、二程之階梯^{②0}」，把《學的》比擬成總結朱子之言，作為進入北宋理學的門徑，是辭旨兼優，能得丘氏之心之言。就程、朱理學的整理發展過程來看，像《朱子學的》這類的編著，無疑是合理必需，而且有價值的工作，至於能否稱職，則只能視編著的選材和組織而定。

宋元朱子學讀本的編輯和流傳

但就丘濬編輯《學的》的理據而論，更值得我們研究的，則是丘氏此舉，是否有其客觀上之必要的問題。亦即是說，是否同類的編纂，前人曾未從事，因而他有必要為之創舉；或是前人已有所作，而尚未臻理想，因而他還有補遺備美的餘地。要探究這個問題，我們便得先檢討朱子身後系統表述朱子學說的著述所作出的表現。

全面而系統地收集朱子學術見解和思想言論的文獻，自然是《朱子語類》這一類的編纂。「語類」顧名思義，是把朱子的遺言分門別類，使各形成易於集中表現和方便研讀的個別系統。「語類」的基礎，則是朱子門人各自所記朱子之言的「語錄」。朱子講學時間甚長，門人甚盛，故錄者也甚眾多，因此「語類」的編纂，只能在多種「語錄」出現後才能進行。現存最完善的「語類」，是一二七零年（宋度宗咸淳六年，朱子歿後七十年）導江黎靖德所編的一百四十卷《朱子語類》。此書「綜合了九十七家所記載的朱子語錄」^{②1}，所根據的，是一二一五年（宋寧宗嘉定八年）至一二六五年（咸淳元年）間編刊的所謂「三《錄》二《類》」（更確切的說，應是「四《錄》二《類》」），亦即一二一五年池州刊李道傳編的四十三卷《朱子語錄》（此本其後續增張洽所錄一卷，一二二零年〔嘉定十三年〕魏了翁眉州刊黃士毅編的一百四十卷《朱子語類》（此本一二五二年〔宋理宗淳祐十二年〕又有徽州刊本），一二三八年〔宋理宗嘉熙二年〕饒州刊李性傳編的四十六卷《朱子語續錄》，一二四九年〔宋理宗淳祐九年〕饒州刊蔡杭編的二十六卷《朱子語後錄》，一二五二年〔淳祐十二年〕徽州刊王泌編的四十卷《朱子語續錄》和一二六五年建寧刊吳堅編的二十卷《朱子語別錄》^{②2}。這些「並行而錯出，不相統一」^{②3}的刊本《語錄》和《語類》，有記載重複之處，有所載可疑之處，也有難校不精、文字脫漏之處，所以連黎靖德也有「嘗受讀而病其難也」^{②4}之歎。但即使黎氏所輯的這部剛除重複、刊削可疑而得「頗清整易觀」^{②5}的《朱子語類》，事實上也不免了「卷帙浩繁，見者往往生畏，不能卒業」^{②6}的遺憾。所以有了完善的《朱子語類》，只能算是有了一套朱子講學遺言的完備總匯或便於檢用的資料庫，仍不等於有了一本能使學者入門對朱子全體學說粗得梗概的專著。

為了使朱子的遺言要義容易普及學者，《語錄》或《語類》的選本或節本，自然也會應時出現。現存最早的這種選本，是朱子的再傳門人葉士龍編纂的《晦庵先

生語錄類要》^⑳。葉氏字雲叟，號澹軒，龍泉人，弱冠徙居考亭。時朱子已歿，從黃榦遊甚久。黃榦歿後，且曾為作行狀，可以稱為高第弟子^㉑。（但葉氏編纂此書，《宋元學案》和《宋元學案補遺》的葉氏傳略中，均沒有清楚提及^㉒。）這本現今罕見的《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共十八卷，採輯朱子門弟子四十四人所記的語錄，以類相從，分成以下的四十八個子目（以下分號表示卷次）：太極，命；心，性，心性，氣；總論四端，仁；義，仁義，禮，智，敬義，敬；誠，道，忠恕，忠信；陰陽造化，五行氣運，律曆，天文地理；鬼神；古今人物；君道，禮制；祭祀，昏禮，喪葬，官制；古今事類；政術；科舉，刑法，處變，儀刑，警戒，出處；學術；持養，為學功夫；論經傳子史古今文集；讀書法；議論，疑難，字訓義，論異端之學，雜說。全書一共有一千四百五十五則，每則多即一條，間有超過的，全部共有朱子語一千五百四十一條。

此書宋代原刻時，題作《（文公？）語錄格言》，理宗嘉熙二年（1238年）朱安作序，提到此書的緣起說，葉士龍「讀文公之語錄而取其會於心者，編為一書，名曰《格言》，是為有以自得之矣。既又慮其（朱子）法博而覽者之未易能也，又為之目，各以類相從，使不待心思智慮而瞭然目睫之間。」說明了葉氏所採擇的，是本於所學之自得；而編輯成書，則是出於幫助讀者能夠清楚卒讀的考慮。理宗淳祐四年（1244年）王遂序此書，又就其取材和價值方面有所申說。序中指出，此書編纂之前，已有李道傳編、刊於池州的《語錄》，黃士毅編、魏了翁刊於眉州的《語類》和朱子門人「建安楊與立以所見聞」而為的《語略》。但這三種刊行的編錄，都有不能盡人意之處，而葉氏此書，則因「雲叟之從勉齋（黃榦）日久，凡文公言行知之詳者，莫若勉齋，則其記錄之也，亦必無張、朱之所竊議」的毛病。王氏所謂的「張、朱之所竊議」，指的是「語類」之類的纂述，朱子曾向張栻表示過恐其「長好速由速之心，溢入耳出口之弊」^㉓的意見。葉氏所編，既無此弊，故有能使朱子之言清楚明白，如「高山大川，無不在吾目睫矣」的優點。

作為最早的《語錄》分類選本或《語類》重編節本（按：此書的子目和編次，顯示了它並非直接取材於眉州所刊的《語類》，葉氏此書在宋、元時代頗受肯定和歡迎。元成宗大德六年（1302年）詹天祥因為「近年書市本兵燬不復存」，乃據家藏宋「殿講進齋徐公」（按：即真德秀著名門人徐幾^㉔）手校本重刻刊，又因徐公對於此書「絕愛其簡切，且門類尤便尋繹，更為題曰《語錄類要》」，所以重刊本也改題書名作《文公語錄類要》。詹氏刻書跋語，稱「堂長此編，豈易能哉！非明不足以有別，非精不足以有索也」，同樣看中了此書在分類和選材兩方面的長處。此書雖然只是一種選編，但在宋時已經是「見者如獲重寶」，至有「書市本」的刊行。可見即使內容未臻完美，但有了簡切入門之便，可以滿足一般讀者之需，故此便有流傳的價值了。

但入了明代後，此書卻顯然傳本稀罕，沒有宋、元時代的流行。直到明憲宗成化六年（1470年），才有婺源知縣韓儼捐貲為之重刻，題目訂作《晦庵先生語錄

類要》。這一明代中期的重刻本沒有再次翻刻的記載。事實上，此書連《四庫全書》也未見著錄。《四庫全書》對於宋人的著述，稍有價值或稍經名人品題過的，幾乎照數著錄。此書名目不見，正證明了它的流傳極端有限。難怪《宋元學案》原編者所作的《葉士龍傳略》，也不能道及他曾編有此書的事了。據韓儼所作本書跋語，他也是在成化四年（1468年）冬，才在浙江的友人處始見此書。次年他復任婺源知縣時，才得朱子九世孫餘杭縣丞朱琳所錄稿本，然後才加以考校補闕，命工重刻的。

無獨有偶，捐貲重刻此書的韓儼，正是丘濬的好友。韓儼歿前，曾命其弟韓俊持書求丘濬作其先人阡表，丘氏因為作《義泉阡韓氏先塋表》^㉕。據此文，知韓儼為山西修武人，正統十二年（1447年）舉人，曾和丘濬為太學同學，但宦績未顯，只官至婺源知縣致仕。文中又提及，韓儼歿後，丘氏曾為作墓誌銘及祭文。此二文今傳原本的《丘氏文集》未見，但文集仍有《韓敬夫遺像贊》^㉖及《贈韓敬夫序》^㉗二首，足以見二人的交誼。次首即贈韓儼出宰婺源之作，大旨勉韓官於文公桑梓，當遵文公治南康、漳州之法式，要以文公為師，「推文公之道以行之」。這種朋友相勉之義，多少透露了他們彼此之間在學問上的同好和期許。韓氏見《晦庵先生語錄類要》而亟為之重刊流傳，也就是同聲相應的一種反映。丘氏贈序說韓儼出宰婺源，在其舉鄉試、入太學後十六年，則其時當值天順六年（1462年），次年丘氏的《朱子學的》成書，較韓氏重刻《語錄類要》早了七年。從他們編書和刻書的用心處看，他們都有着如韓氏跋語中所稱的這樣一個關心點：「俾後進之士講習之熟，於先生（朱子）註述經傳之理，亦有以貫通而造其精微之蘊。」所不同的是，《學的》更經一番精心排比，更顯得次第連貫，更使朱子學說要義顯明易見而已。

《晦庵先生語錄類要》這本宋人編輯的分類語錄選本，畢竟未能全面的照顧到朱子學說的各項精義和不同層次的見解。原因在於它只採用「語錄」，沒有採及《朱子文集》和經書傳註的文字。所以它只能是一種參考書籍，只有輔助的性質。

宋人以朱子「《文集》、《語類》排比綴輯，分門隸屬」^㉘來系統化朱子學說的纂述，現知的還有題作王泌編的《紫陽宗旨》和由張洪、齊庶同編的《朱子讀書法》二種。《紫陽宗旨》近代未見傳本，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曾列其名於「子部儒家類存目一」，據此書《提要》所言，「王泌東陽人，即淳祐壬子（1252年）作《朱子年譜序》者也。」《提要》對於此書的年代沒有說明，對其內容則說「其書採輯朱子《語類》、《文集》；分詩人、析理、明經、論事四門，每門又各分子目；其中註語，有出朱子原文者，亦有出泌所增識者^㉙。」《提要》還有考證文字，指出此書見於明代的《內閣書目》和清初的《千頃堂書目》，但所列卷數，又均與《四庫全書》登錄本的不同，大意則疑此書實非王泌所作，故於內容不再評說。

《紫陽宗旨》看來篇幅還不少，編中既有編者（王泌）的「增識」，其欲突顯

朱子學說的「宗旨」，便更明白易見了。按：王泌是朱子的四傳弟子，卒業於魯齋王柏，如上文所揭，他是徽州刊《朱子語類》的編纂者。王泌序該編於一二五二年，稱黃士毅（子洪）所編《語類》出後，他曾訪其所遺「凡三十有餘家，既哀以為發《錄》，又再「審訂其複重，參舉其端緒，用子洪已定門目，粹為《續類》，凡四十卷³⁷。」顯然，《紫陽宗旨》並非《續類》。王泌編纂《紫陽宗旨》之事，宋、元人均無所記載，《四庫提要》所引《浙江通志·經籍門》中此書的著錄形式，反而可見前人已疑其非王氏所作之意³⁸。有可能《紫陽宗旨》有取材於王泌《朱子語類》之處，故此牽連產生了關係。至於它的出現，大抵應在一二五二年徽州所刊《語類》及《續類》出現之後。它的流傳情況，則實無可考；《四庫全書》館臣所見之本，肯定也是極其稀罕的了。

至於張洪、齊原同編的《朱子讀書法》³⁹，則成書於宋度宗咸淳二年（1266年）。此書是增補和改編朱子門人輔廣所編集的朱子《讀書法》的纂述。據張、齊二人所作序言，他們合編此書，始於宋理宗淳祐十年（1250年），至一二六五年才定稿，次年才序刊。是書分上、下二卷，以輔廣原本為上卷，以增補的為下卷。編輯的次第，如齊原所言：「先定綱領，以載書之所當讀之故，與讀之所當務之說。復於中撮其樞要，釐為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而著其說於每條之下。」編者的目的，則是希望同志讀者，能把這些綱領條目所列的朱子之說「按為定式，確遵謹守。」理由是朱子之「為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質之以敬；其窮理則以讀書為本，其讀書則以六者為法⁴⁰。」這等如說，學者當由朱子的為學方法去達到朱子的為學目的。

對於這本教人從事朱子治學方法的基礎書籍，《四庫全書》館臣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提要》說此書「雖摭拾抄撮稗販舊文，不足以言著述，而條分縷析，綱目井然，於朱子一家之學，亦可云覃思研究矣⁴¹。」按：張洪、齊原均是鄱陽人，是書成編時，張洪正在四明教官任上，故此他「欲刊之鄞泮，以惠多士」⁴²，又得當時「師帥大參西澗先生……助費召匠，亟命鏤梓，與學者共之⁴³。」考張洪、齊原二人，《宋元學案補遺》有其合傳，繫於「潛庵（輔廣）私淑」之列⁴⁴。西澗先生，則是官至丞相的葉夢鼎，《宋元學案補遺》有傳⁴⁵；夢鼎受學於趙逢龍，而趙氏之學未見師承⁴⁶。張、齊、葉三人皆與朱門無直接師承關係，卻對朱子學說這樣的用功致意，慶元偽學黨禁解除以後，晚宋朱子學備受尊崇的情況，由此可見一斑。我們須要注意的卻是，《朱子讀書法》一書質素雖高，但它所處理的，畢竟只是朱子的讀書法，而不是朱子學理的全體。

《朱子讀書法》原本今已不傳。據《四庫全書》此書《提要》說，此書「元時板已不存，至順中江南行臺御史趙之繼重鑄於集慶路學，故《永樂大典》全帙收入。原編卷次已不可考，今酌其編帙，釐為四卷。」現在唯一的傳本便是由《永樂大典》中抄出改訂的四庫全書本，明代沒有重刻此書的記載可尋。

宋人所為有意系統化綜結朱子學說，使其便於初學入門深造自得的編纂，文獻可徵的，就只有上述的三種。其中可以略為詳考的《晦庵先生語錄類要》和《朱子讀書法》二種，有這樣的相同流傳之處：它們在宋末流行，在元代有重刻，到了明代卻變成了寂寂無聞。這個現象，固然和元末兵亂之後，版籍散燬，印本不再，以致傳本日稀、見者日少的情況有關。但「稀罕」卻不能是長期隱晦的唯一解釋。要尋求整體的原因，我們還得從當時學者的愛好和他們用心致力之事上去考慮。時代風尚趨變和此類作品的顯隱，實際上是互為因果和互可反映的。以上所舉二書，雖在元代均有重刻，反映了它們仍受重視，但元人卻未見有同類的著作可考。推而言之，宋元學者對朱子學的用心注意之處，已經發生變化而有所不同了。

考察文獻的結果，我們可以發現，元人對於朱子學的從事，其實別有所好。治朱子學者的主要趨向，是增益豐富朱子之言，而不是精簡要約朱子之言，而且多數學者的功夫，都是花在朱子《四庫集註》的集釋之上。這現象並非到了元代才突然出現的，其實宋末已經開始，只是元代更變本加厲，而且性質也漸漸有所不同而已。時代因素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朱子遺文和講學遺言的編集，透過《文集》、《語錄》、《語類》等的各種編纂，到了南宋末葉，已經沒有用功從事的必要和餘地了，學者注意力的別轉，是自然之事。隨着宋末朝廷尊崇朱學和元代科舉的特重程、朱傳註，朱子學者所關心的，便不期然匯聚於與科舉尤有關連的朱子著述上去了。朱子對《四書》的傳註，成了學者用功的焦點，而晚宋真德秀的《四書集編》和趙順孫的《四書纂疏》又為他們提供了典型。《四書集編》的做法，是引用朱子的《四書或問》和《語類》、《文集》所載關於《四書》的言論，對《四書集註》本身再加添註，以收澄清發明之效⁴⁷。《四書纂疏》在同樣的基礎上，又旁引了朱門十三家相關之說為曲證⁴⁸。這類以朱子文字或朱門後學的闡說對朱註《四書》作補充的工作，元代繼續蓬勃發展，其中質素較高的，有胡炳文的《四書通》⁴⁹和詹道傳的《四書纂箋》⁵⁰，而早期劉因的《四書集義精要》⁵¹和末年史伯璣的《四書管窺》⁵²，則因能對諸家所說的自相矛盾之處，並加刊削和別白，成就尤其突出。但這類工作的發展，其實是盡元代而窮的，故此入了明代，並沒有足以媲美並論的編纂出現。永樂朝纂輯的《四書大全》，實際上只是點綴元人倪士毅所纂的《四書輯釋》而成編的⁵³。

結語

回顧過朱子身後二百五十年間學者從事朱子學說的概況後，我們不難發現，到了明代的初期，儘管朱子學說已因科舉定制而變成官學，朱子學說所寓的著述，如《文集》、《語錄》、《語類》和經書的傳註，也都已經編纂齊全，但對於系統性表達朱子學說的工作，尤其幫助初學者掌握梗概以利深造自得的，卻是十分不足，乏善可陳。就像《晦庵先生語錄類要》、《紫陽宗旨》和《朱子讀書法》這些宋人編纂的，當時能夠知道或曾經見過的人，也極其有限，微不足道。整個局面對於闡揚朱

子學說大為不利，宋學的精粹，反被朱子著述的數量和尊朱科舉用書的祖濫所隱蔽了。朝廷尊朱的本意未達，學者學朱的本領沒有著落，朱子學說其實只是表裏裏衷，它的精蘊還待有效地發揚普及。

從這個角度看，丘濬《朱子學的》的出現，在明代朱子學的發展史上實有一種劃時代的意義。無疑它是對當世情況作出反應的產物，它標誌着朱子學者對如何傳授朱學精義這一老問題的新體會和新認識。而這個新的體會和認識，至少在以後的二五十年間，又曾發生明顯的作用。明、清二代同類的編纂，為數甚多，《四庫全書》館臣甚至誇張地說是「指不勝屈，幾於人著一編」^⑮，但都是出現在《朱子學的》之後的。這個從文獻顯示出來和《朱子學的》的多次刊行的事實^⑯，客觀地顯示了《朱子學的》獲得肯定的程度和在朱學發展史上曾經起過的作用，它的價值，因此可以不言而喻。當然，要到了十五世紀下半期才有像《朱子學的》這種能使朱學要義具見梗概的書籍出現，也就可說是朱子學發展的障礙了。

註：

- ① 張廷玉等纂《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81.4808—10，本傳；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249-52, Chi-hua Wu 及 Ray Huang 撰傳。
- ② Hung-lam Chu (朱鴻林), "Ch'iu Chün (1421-1495) and the *Ta-hsien yen-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Lee Cheuk-yin, "Ch'iu Chün (1421-1495) and His Views on Government and History," Ph.D dissertation,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1984.
- ③ 日本崎門學派始創者山崎闇齋 (1611—1682年) 對丘氏學之看重，尤見突出。參看 Okada Takehiko, "Practical Learning in the Chu Hsi School: Yamazaki Ansei and Kaibara Ekken," 收於 Wm. Theodore de Bary and Irene Bloom, eds., *Principle and Practicality: Essays in Neo-Confucianism and Practical Learn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年), pp.231-305.
- ④ 丘濬《瓊蕊詩文會稿重編》（明天啟三年刊本），9.1上—2下，〈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 ⑤ 丘濬沒有從祀孔廟，但他關於從祀標準的言論，卻在萬曆初年朝臣爭議從祀王守仁的事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關討論，見 Hung-lam Chu (朱鴻林), "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48 No.1 (June 1988), pp.47-70.
- ⑥ 有關丘濬諸多著作的考察，可看前揭 Hung-lam Chu, "Ch'iu Chün (1421—1495) and the *Ta-hsien yen-i pu*," pp.445-453, "Bibliography" 部分；Lee Cheuk-yin (李煥然) "The Works of Ch'iu Chün: A Bibliographical Study," 《明清史集刊》第2卷 (1986-88年), pp.125-161。按：舊傳為丘濬所作的傳奇小說《鍾情麗集》，近年來的研究已論證了其非丘氏之作，詳見 Hung-lam Chu (朱鴻林), "The Authorship of the Story *Chung Ch'ing Li-chi*,"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Vol. 1 Pt. 1 (January 1988), pp.71-82；徐朔方，〈小說《鍾情麗集》的作者不是邱濬〉，徐著《徐朔方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1卷，頁777-79。
- ⑦ 有關《大學衍義補》一書在明代及清代前期所產生的影響情況，見 Hung-lam Chu (朱鴻林)，

"Ch'iu Chün's *Ta-hsien yen-i pu*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Ming Studies* No. 22 (Fall 1986), pp.1-32.

- ⑧ 介紹此書的體例和討論書中的丘氏史學觀念與史論主張之作，有李煥然〈丘濬之史學——讀丘濬《世史正綱》札記〉，收於《明史研究專刊》第7期（1984年6月），頁163—208。
- ⑨ 全面和深入討論《家禮儀節》的著作，尚未出現。但與此書不可分離的（朱子）《家禮》的研究，則有 Patricia Buckley Ebrey, *Chu Hsi's Family Rituals: A Twelfth-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 Weddings, Funerals, and Ancestral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二書，可以參考。
- ⑩ 《朱子學的》書末有丘濬識語，即一般稱作〈學的後序〉的，署「天順癸未春正月」，即天順七年（1463年），時任翰林院編修，距景泰五年（1454年）登第被選為庶吉士，已經九年。
- ⑪ 弘治十四年至萬曆三十四年的刻刊概況，見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重校刊本《朱子學的》書前朱吾弼〈序〉及書後郭謙〈記〉。
- ⑫ 筆者所見和刻訓點本，題作《學的》，其體式和內容與現存北京圖書館所藏明刊本《學的》相同，可見和刻本所據的正是這個明刻本。這二本均沒有郭謙和朱吾弼等的序跋文字，篇章行款格式也和收入郭、朱二氏文字的康熙間張伯行正誼堂刊本不同。可見丘氏此書明代已有二個不同的版本存在，而題作《學的》的刻本，應是較早出現的一個。有關北京圖書館藏《學的》的體式和內容的概況，係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陳祖武教授代檢賜告，謹誌感謝。
- ⑬ 這個瓊山刊本和其後據以重印的石洲草堂校刊本，除了翁方綱和費丙章前後有關編刊的文字外，也沒有任何前人的序跋，校刊本扉頁且有「邱文莊公原本」字樣，可見它與康熙間張伯行正誼堂刊本所據的，淵源各別。石洲草堂刊本《朱子學的》的部分卷首資料，係承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胡守為教授代檢賜告，謹誌感謝。
- ⑭ 此段有關《朱子學的》刊行史的文字，為了因應本文的篇幅和關注所在，只以結論形式出現。有關此書的版本和流傳問題，筆者擬在另文詳細考述。
- ⑮ 《瓊蕊類稿》（弘治間刊本），13.8上—10下。又《瓊蕊詩文會稿重編》，9.30下—33下。
- ⑯ 下文所引《朱子學的》本書及〈後序〉文字，均用同治五年福州正誼書局重校刊本。按：此本即斷句通行本所據的本子，也見收於丘文莊公叢書輯印委員會印行的《丘文莊公叢書》內（台北，1972年）。
- ⑰ 永裕、紀昀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1年《萬有文庫》本），第18冊，頁95—96（子部儒家類存目一）。
- ⑱ 為《四庫全書》撰寫〈提要〉的館臣，除了強調考據的一般主張外，也有因個人的道德觀念或學術偏好而對明人的著作產生偏見的。例如同一個人的相同著作，在不同（人撰）的〈提要〉裏，卻有截然相異的評價。拙作一篇，曾示此例，見 Hung-lam Chu (朱鴻林), "High Ch'ing Intellectual Bias as Reflected in the Imperial Catalogue,"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Vol. 1 No. 2 (Spring 1987), pp.51-66.
- ⑲ 兩引朱子語，均出《近思錄·後序》。此書近代中文注本為陳榮捷著《近思錄詳註集評》（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2年）。此〈後序〉見該書頁575。清代張伯行《近思錄集解》（台北，世界

- 書局，1975年）本，則移此文於書前，題作〈前引〉。
- ⑳《朱子學的》，張伯行撰（原序）。
- ㉑ 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年）；書前鄧艾民《朱熹與朱子語類》，頁8。
- ㉒ 以上各種朱子《語錄》及《語類》的名稱、編算年代及序數文字，均見上揭《朱子語類》目錄之前。
- ㉓ 黎靖德《朱子語類卷目》後「景定癸亥秋八月戊申朔」識語，見上揭《朱子語類》〈朱子語類卷目〉，頁35。
- ㉔ 同㉓，頁24。
- ㉕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8冊，頁32（子部儒家類二），《朱子語類》提要語。
- ㉖ [清] 賀瑞麟《重刻朱子語類序》語，見前揭《朱子語類》書前。
- ㉗ 此書今極罕見。本文所據用的，是台北中央圖書館所藏明憲宗成化庚寅六年（1470年）婺源知縣韓儼刊本。書前有宋理宗嘉熙戊戌二年（1238年）仲秋朱安序及理宗淳祐甲辰四年（1244年）季春王遂序；書末有元成宗大德壬寅六年（1302年）二月烏天祥跋及明成化庚寅九月韓儼跋。
- ㉘ 《晦庵先生語類要》書前王遂《朱子語錄格首序》，書末烏天祥識語。指出蔡士龍「實狀（勉齋）其行」的，是烏天祥。
- ㉙ 《蔡士龍傳》，見黃宗竑原著、全祖望補修《宋元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63.2048，「勉齋門人」下。按：該傳附馮雲濠按語，謂葉氏「編《朱子語錄》十八卷」，稍誤，當指《語錄類要》才對。王梓材、馮雲濠同撰《宋元學案補遺》（台北，世界書局，1962年），63.18下，引「劉後村跋勉齋書卷後」語，作附錄，言葉氏於黃門為「尤可重也」。
- ㉚ 引語出魏了翁《眉州刊朱子語類序》，見前揭《朱子語類》書前〈舊序〉部分，頁9。魏序言：「且張宣公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而文公猶恐畏學者欲速好遲之心，溢入耳出口之弊」，是朱子的這種隔慮，首先是因張栻的工作而發的。
- ㉛ 《徐幾傳》，見《宋元學案》，81.2714，「西山門人」下；《宋元學案補遺》，81.43上一下。
- ㉜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23.46下—48上。
- ㉝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22.37上一下。
- ㉞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13.18上—19上。
- ㉟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8冊，頁48（子部儒家類二），《朱子讀書法》提要語。
- ㊱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8冊，頁87（子部儒家類存目一），《紫陽宗旨》提要語。
- ㊲ 王遂《徽州刊朱子語類後序》，見前揭《朱子語類》書前〈舊序〉部分，頁11。
- ㊳ 同㊲。
- ㊴ 此書今唯見於《四庫全書》，屬於「子部儒家類」書。本文所據用的，是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709冊。
- ㊵ 以上三引齊巖之言，見《朱子讀書法》，卷首，頁4下、5下，〈編定朱子讀書法原存〉齊巖存。
- ㊶ 本書「提要」見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如㊳。
- ㊷ 《朱子讀書法》，卷首，頁6下，〈編定朱子讀書法原序〉齊巖序。
- ㊸ 《朱子讀書法》，卷首，頁2下—3上，〈編定朱子讀書法原序〉張洪序。

- ㊹ 《宋元學案補遺》，64.53上一下。
- ㊺ 《宋元學案補遺》，79.57—59下。
- ㊻ 《趙送龍傳》，見《宋元學案補遺》，79.39下—40上。
- ㊼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7冊，頁109—110（經部四書類一），《四庫集編》提要。按：真德秀此書29卷，四庫全書本之外，尚有通志堂經解本。
- ㊽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7冊，頁113（經部四書類一），《四書纂疏》提要。按：趙順孫此書28卷，四庫全書本之外，尚有通志堂經解本。
- ㊾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8冊，頁3（經部四書類二），《四書通》提要。按：胡炳文此書26卷，四庫全書本之外，尚有通志堂經解本。
- ㊿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8冊，頁5（經部四書類二），《四書纂箋》提要。按：詹道傳此書28卷，四庫全書本之外，尚有通志堂經解本。
- ①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8冊，頁1（經部四書類二），《四書集義精要》提要。按：劉因此書36卷，四庫全書本之外，尚有1977年台北故宮博物院影印元至順間原刊本。
- ②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8冊，頁6—7（經部四書類二），《四書管窺》提要。按：史伯瑄此書8卷，四庫全書本之外，尚有敬鄉樓叢書第3輯本。
- ③ 參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8冊，頁8（經部四書類二），《四書大全》提要；第8冊，頁25—26（經部四書類存目），《重訂四書輯釋》提要。按：倪士毅此書《四庫》存目所錄者為20卷，台北中央圖書館所藏明刊照口本《四書輯釋章句通義大成》為40卷，日本文化九年（1812年）復刊日新書堂本《四書輯釋大成》則成36卷。又上述④起至此處所提及的宋元人闡釋《四書》的各個作品，還沒有現代的研究專文可作參考。林慶彰編《朱子學研究書目》（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頁37—45，所列研究朱子《四書》有關論文，沒有一篇是專題論析上述各書的。
- 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第19冊，頁18（子部儒家類存目三），張伯行《續近思錄》提要中語。又同書第18冊，頁60（子部儒家類二），呂柟《朱子鈔釋》提要，亦有「明人遞相選錄，幾於人有一編」的話。
- ⑤ 本文尚未對《朱子學的》的傳刻詳情和明清學者對此書的評論加以述析。這些應該處理的課題，以及《朱子學的》出現後同類叢著的情況，筆者擬有另文予以討論。